

# 忆文革

燕南 2024.3.16

文革开始那年，1966年，我在福建教育学院的函授广播学校教英语，时年25岁。我非党非团，但自视是体制内人，因为我是烈士子弟，是红五类。本来我负责闽南片，还独力编写英语辅导教材，顺风顺水的。文革一来，英语停课停教了，我们就开始投入运动了。函授广播学校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们（如我）让管人事的老刘来向大家投放有问题的同事们的档案资料，如曾经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，反右时有什么右派言论，本人和亲属有什么历史问题，等等。然后大家就讨论先揪谁后揪谁，集体写大字报。

运动越演越盛，红卫兵起来了，还南下到福州。福建省委专门在五一广场召开大会，省委书记叶飞亲自到场，还请北京来的红卫兵登台讲话。不久，传出各单位可以派革命群众去北京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并学习怎样开展文革。我们人是选出来了，但什么时候动身却是一个秘密，因为我们这些“组织”安排的人显然属于保守派，而社会上此时已经有造反派争着要上北京了。我们近20人（右边照片，笔者为后排左三）带行李被接到一个学校住。半夜传出要走了，转了一圈又回来。隔日，又宣布行动，这回真正上了火车。



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，毛泽东在三个多月时间里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。我们的是10月份，应该是第五次。我的弟弟也在同一时候来到北京。他随他们学校（龙海一中）来，随他们学校回去。右上图是我们和我们在北京的表姐弟相会和拍照。



虽然文革是政治狂热的时期，我个人却是相当清醒的，不投入、不卷入；不怕人整，也不必整人。我的政治启蒙来自一本书：[《第三帝国兴亡史》](#) ([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: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, by William L. Shirer](#))。因为第三帝国的崛起方式和组织在文革中都有对应。趁大串联，我去了北京两次，并独自去了杭州、上海、大连和广州这些我心仪已久的地方。武斗开始，社会大乱时，我在家乡当逍遥派整整一年，工资每个月由孔义寄到石码给我。运动后期回到教育学院，仍然可以做我想学想做的事，包括木工和武术，还交了象[慕适](#)这样的好朋友。有一度风行“早请示，晚汇报”。审查对象们低头列队站一旁“请罪”，革命群众们站在老毛的大塑像前三呼“万岁”和“永远健康”。我参加了一次，从第二天起我就提早出门，经过门口站岗的军宣队，去十分钟外的西湖公园晨练了。



一九六九年十月底，[福建教育学院\(含函授广播学校\)](#)到了“斗、批、散”的“散”了。还有问题的人(原“牛鬼蛇神”)不能走，正掌权的人和有门路的人也不走，其他的人就大批下放了。我们成了省级机关的首批“蹲点下放”干部，分配到全省各个农村去。走之前，说好户口全迁(到公社，仍属城镇户口)，但工资待遇不变。[我下放蹲点到](#)

[南靖县和溪公社](#)，从此离开省级机关这种庙小鬼神大的是非之地。



我下放蹲点近六年。下乡的日子，让本来一直在校门内的我，有机会下到人生与社会的底层，知道了自己的幼稚与无知，知道了农民的疾苦，知道了社会的复杂和体制的不公。这段经历对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五十年过去。我特别怀念我在南靖县和溪月星山头小村庄的日子。月星在两县的交界，从深山密林里穿过去，两三小时后就可以到达邻县漳平的“永福”。月星小队竹林密布。出门走在小径上，一不小心就会踏到破土而出的竹笋尖。洗衣做饭的水都来自一条山溪。山溪二十几米宽，但很浅。平时清澈见底，一下雨马上混浊如黄河水。当然，没有电。村民们食用米是靠一个水力推动的古老的石舂(类似下图，但规模小得多)。月星离公社所在地相当远。要赶墟先要走一个小时左右的山路，然后还有十几里的公路，步行起来也要一个多小时。两小时的路，

是漫长的，是孤独的，是失落的，但我有自己独特的消遣方式：背诵名家诗歌散文。我把散文短篇和英文诗用打字机打在活页纸上，每次带几张在路上背。八年以后，我当了厦门大学外文系“英美文学”的研究生，所读所背的，其实还没有我在这些山间小路上背的多。

